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周跃辉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如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际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既是我国宏观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微观领域每个市场主体必须面对的发展环境和历史背景。

何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辞海》对“循环”一词的解释是,“往复回旋,指事物周而复始地运动或变化”,通俗地讲,就是事物或物质在一个闭环当中,周而复始地运动。理解“循环”的含义,最直观地可以从生物学上的“血液循环”来认识。血液在心脏的作用下循着一定方向,在心脏和血管系统中周而复始地流动,这个循环包括体循环和肺循环,并互相连接,构成完整的循环系统。“经济循环”也是同样的道理。

什么是国内大循环——

经济学上一般将国内循环的主体分为三部分——家庭(居民或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家庭(居民或消费者)是要素市场的供给方,也是产品市场的需求方;企业既是要素市场的需求方,也是产品市场的供给方;而政府通过征收税收和购买产品等经济行为,参与国民经济大循环。

国内大循环,主要包括两大循环,即商品和要素循环、资金循环。其中,商品和要素循环又称实物循环,主要有两条具体途径:其一,企业将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通过产品市场交换,卖给家庭或者消费者。消费者获得商品之后,进行消费,然后通过要素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入企业参与劳动。家庭或消费者通过在企业从事生产工作生产出产品,这些产品再通过商品市场出售给家庭或消费者,由此形成周而复始的商品和要素循环;其二,企业将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通过产品市场交换,卖给了政府。政府通过购买消费品或投资品等途径,将企业生产的商品进行消费或投资,同时政府以税收等收入支付这些消费品或投资品。企业拿到这些收入之后,进行再生产,从而形成周而复始的商品和要素循环。

资金循环的路径为,企业通过股权或债权获得启动资金之后,也就是拥有资本金以后,从要素市场购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开始组织生产。这个过程,企业要将资本金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家庭或劳动者,劳动者就获得了工资报酬。劳动者获得这些收入之后,他要通过商品市场购买商品和劳务,而这些商品和劳务是由企业生产的。因此,当劳动者购买商品和劳务之后,这些资金又回到了企业手中。当然,这些资金可能已经实现了增值。企业家将这些收入再去购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再进行组织生产。这样就形成了资金的循环往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品和要素循环、资金循环这两大循环,实际上可以概括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正是通过这四个环节,实现了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大循环,从而确保国民经济顺利运行。

什么是国内国际双循环——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

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程度能够反映其发展战略导向。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资源型产品的出口,从中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

技术外溢效应,最终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相对于出口导向带动高速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无法有效推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增长。

我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典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比如,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技术受限,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经济体在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

因此,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加上国外经济部门,就构成了国内国际大循环。具体来讲就是两个步骤:第一步,国外部门从国内产品市场购买产品,支付外汇,国内企业获得外汇,这实际上就是国内出口的过程;第二步,国内企业用这些外汇,从国外部门进口国内市场所需要的商品、劳务或要素,外汇流出国内,这实际上就是国内进口的过程。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实际就是通过出口和进口,加入到了国际大循环中去。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加在一起,即为我们所讲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何为需要“双循环”?

应该说,过去4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融入国际大循环。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融入国际大循环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是,我国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我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等问题。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明显。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此可见,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开始逐步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也就是更加重视内需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

2014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有两个判断:一是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科技进步;二是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中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新平庸”,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首次明确阐释经济新常态下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关系。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政策导向为“三去一降一补”。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

2017年10月份召开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

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美国针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不断升级,这对中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此外,在中国南海、东海等领域安全局势也面临更加显著的不确定性,台湾等问题变得更加敏感,这也意味着台湾的发展环境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也正是我们为何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原因所在。

何为推动“双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内涵。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通过挖掘消费潜力,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在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促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此,需要把握住六把“金钥匙”:

第一把“金钥匙”:积极稳妥处理好大国关系,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复杂形势,我们不要轻易谈“脱钩”,要继续发挥好国际大循环的作用。要均衡发展于西方老牌及新兴大国的关系,力争发挥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重点推进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战略协调,善于运筹“集群博弈”,以“新兴大国集群”整体的力量应对西方大国新挑战,增强全球治理话语权。要妥善运筹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等重要三角以及中俄日美四方关系,扩大战略自身回旋空间,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要积极稳妥处理好中美关系,历史充分表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需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好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以应对世界经济与金融所带来的大变局。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第二把“金钥匙”:战略好与周边国家的总体关系,稳妥推进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离不开稳定的周边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国与国的关系讲,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要世代相处下去。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我

们都认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当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是好的。我们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解决争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愿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稳妥处理好中印边境、钓鱼岛、南海等问题。无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必然选择。

第三把“金钥匙”: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略,集中力量办好自己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依靠改革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的重要法宝。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略,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定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事情,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维护国家安全。同时,要抓住商品和要素循环、资金循环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国企国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的是,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决打赢反腐败战争,助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把“金钥匙”:全力支持科技创新,

助推中国高科技立于世界之巅。要想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科技创新无疑是“主心骨”。科技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国家的竞争,说到底还是科技水平的竞争。只有创新强,国内产品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中才有竞争力。我们要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坚持把基础前沿、共性关键、社会公益和战略高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壮大创新驱动的源头力量。特别是应高度关注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尺度向纵深演进,信息技术成为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础,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加快突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加速发展。应顺应科技发展新趋势,维护网络安全,打赢现代信息战争,尤其是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超前部署,力争在更多领域引领世界科研方向,力图使中国的高科技最终立于世界之巅。

第五把“金钥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当前,境外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国际经贸活动严重受阻,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在濒临中断,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显著增多。我国已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当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必须采取措施全力以赴地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事实上,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是维护产业链的稳定。要巩固传统的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突破瓶颈制约,大力推动补短板、强弱项,增强产业链的弹性和韧性,提升产业链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当然,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并不是某一个国家

的事情,我们要加强组织和协调,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尽快控制住疫情的蔓延,推动产业运行回到正常轨道,促进经济社会系统实现动态循环、健康发展。

第六把“金钥匙”:加快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打通国内大循环体系。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等不利局面,要想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可以看到,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十分巨大,但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下一步,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六稳”“六保”政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力争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确保实物循环和资金循环畅通无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期,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紧紧抓住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六把“金钥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原载于《成都日报》2020年8月26日06版)

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历程回顾

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历程

1949年—1978年

这段时间,我国对外经济交往,主要是和苏联进行经济往来,并没有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

1978年

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之后,我国逐步融入到国际大循环中去,这一决策的载体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

1987年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向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该构想很快引发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

1988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中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

1992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我国国际大循环思路的调整

2006年

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因此,“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2011年

“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2014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判断: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中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2015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两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

2018年

经济环境出现变化,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5月14日

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谋划、新布局。

制图:李菲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个经济体若只是有国内大循环,那么就很难获取全球化的红利,就没办法在全球商品、劳务以及要素市场进行交换交易,就很难获得经济上的腾飞。但我国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已很明确。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内涵。